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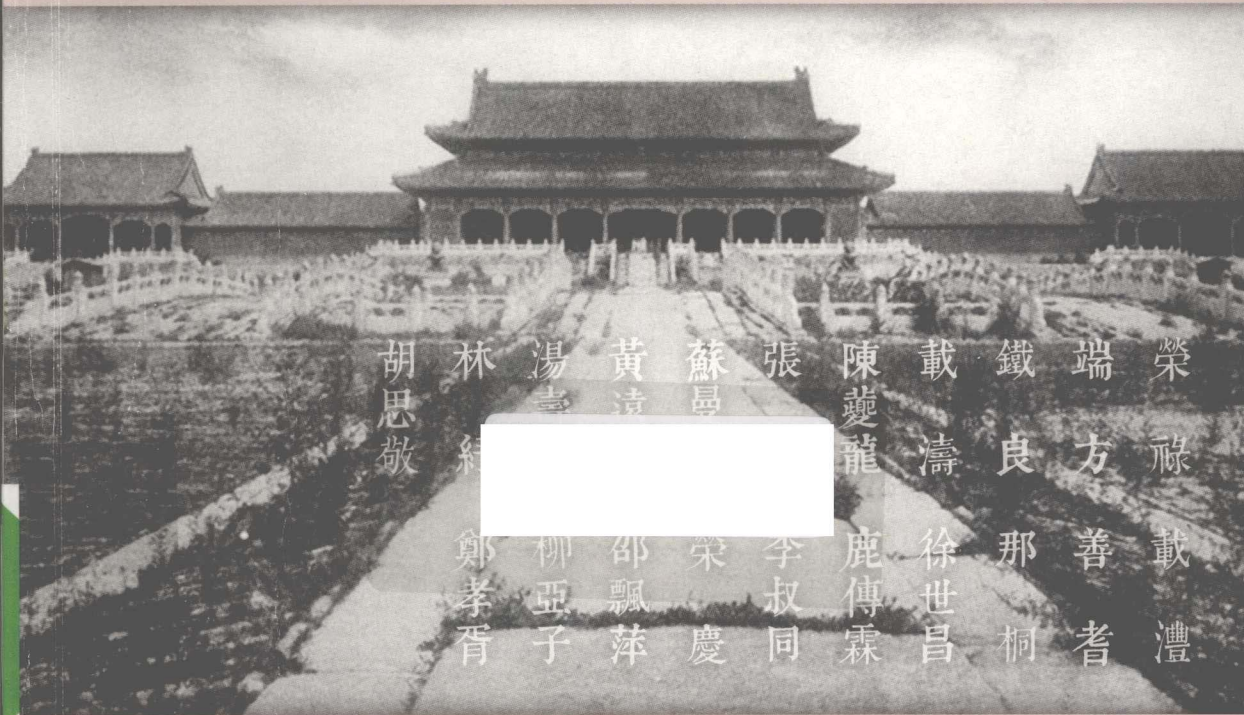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一部)

局中人

王学斌·著

ZUI HAO YU ZUI HUAI DE SHI DAI



榮祿 載灃 端方 善耆 鐵良 那桐 載濤 徐世昌 陳夔龍 鹿傳霖 張 李叔同 蘇曼 榮慶 黃遠 邵飄萍 湯壽潛 柳亞子 林 鄭孝胥 胡思敬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王学斌·著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一部)

局中人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 1 部, 局中人 / 王学斌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60-6525-2

I. ①最… II. ①王…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941 号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一部): 局中人

(ZUIHAO YU ZUIHUAI DE SHIDAI DIYIBU:JUZHONGREN)

作 者: 王学斌

责任编辑: 冯文丹 张莉娟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525-2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早些日子，中央党校年轻朋友王学斌博士发来一部未刊书稿：《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并嘱我方便时为这部书稿写几句。

学斌是我们所里在站的博士后，年龄不大，著述不少，读书更多更细，很有心得。博士论文专攻清代学术史，研究“颜李学派”的发展及结局，颇见学术功力，也打下了一个广博而坚实的学术基础。稍后，著有《民国底气》等，对徐世昌等一大批民国人物均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文笔清新，善讲故事，兼及精深与广大，在青年一辈学人中确实比较突出。

对学斌的这部新著，我怀着浓厚兴致翻看了一遍，因为书中描述的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清末民初。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时代。作者在书中描写了清末大佬荣禄、摄政王载沣、“太子党”善耆、铁良、载涛、端方、那桐，以及清末重臣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陈夔龙，还有民国新旧人物张继、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胡思敬、汤寿潜、郑孝胥、黄远庸、邵飘萍、林纾、黄侃、辜鸿铭。还有一篇上溯近代早期同文馆之争，论及恭亲王、倭

2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

仁、徐继畲、郭嵩焘、冯桂芬等。另有一篇追溯近代变革思想起源，讨论何启、胡礼垣等几个近代人物的思想。这些人物与论及的事件，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因而拜读了学斌的讨论，也有几句话想说。

学斌在导论中讨论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表述，以为“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套用狄更斯的描述，清末民初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新旧杂陈，希望与绝望共在。学斌的这个观察是对的，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说整个大近代都属于这种过渡性质，从传统到现代。

古典的中国创造了精致而早熟的文明，这是不必怀疑的。不论近代西方知识人如黑格尔怎样贬损中国文明，至少在18世纪之前很长时间，见到过中国文明的人，比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不对中国文明心存敬仰，以为中国文明达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高度，也给人类文明以重要启示。西方的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即便与中国文明没有血缘上的直接关系，也与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有着因果关联。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大发明”。

毋庸讳言，中国文明到了18世纪发生了逆转。不是中国文明不行了，而是中国文明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形那样，如饥似渴汲取域外文明、异样文明，中国文明在18世纪之后，顶着康乾盛世的虚名，向世界大声说不，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历史逆转，中国从西方人膜拜的对象一变而成为野蛮、不文明、不开化的象征。

对于这个逆转，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以“悲情主义”进行观察，以为世界亏欠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蚀。这个评判大

方向当然不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确实在这个时间段深刻影响了中国。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弄清这种影响的真意义。

古典中国的文明精致而早熟，是对的。古典中国的文明对域外文明、异样文明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致，接纳、吸收，融为一体，重构自己的文明体系。所以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文化边疆”不断扩大，中国文明的“政治边疆”也随之扩充。从18世纪回望，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扩大到东亚如此广袤的地盘，并不只是血与火，不是战争，而有着文明的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古典的中国文明只是一个农业文明，是在中国这块以农业立国的土地上发生、发展，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都能从这个视角读出新意，从这里才能明白中国文明的真价值、真意义。而西方文明则不然。西方文明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是近代文明，又是工业文明，如果与中国文明相较，显然不是优与劣，进步与落后，而是时代之异，历史的落差。

在古典中国文明中，并不缺少工业文明、近代文明的因子。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中国人的商业意识、经商才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相比都不弱。问题在于，中国智慧太高超了，两千年前，中国人为了社会稳定，坚定不移实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两千年不变，于是遏制了商业，遏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成长，成就了一个“超稳定”的中国文明形态，也使中国再次遇到西方时发生了巨大困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遇到西方，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开始。中国可能没有走好第一步，但要相信中国文明的基本智慧，中国一定能够像一千多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接纳西方，中国不仅会将西方文明像佛教文明那样吸纳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组为宋明理学，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像过去创造“中国佛教”一样，创造出“中国西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就像从东汉至宋明遇到印度佛教一样，异样文明的交

4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

流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一个善于学习的文明一定会利用机会改造自己，丰富自己。

在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新旧杂陈，旧的未去，新的已来；旧轨已破，新轨未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新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转型没有完成。我们都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份子，学斌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些人物，其实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相似，乃至原型。

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历史无定式，是因为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没有办法模拟，没有办法复盘。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

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读了学斌的新著，写下这点感想，仅供学斌批评，供读者各位参考。

马 勇

2013年6月28日

自序

“萧条易代不同时”——清末民初众生相

尝读陈寅恪先生《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其慨叹“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①，颇有今不如昔、无可奈何之意味。“不夷不惠”引自《孟子·公孙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或暗喻此际前朝覆亡，新朝不尽如人意；“非驴非马”语出《汉书·西域传》“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或借指彼时西风劲吹，中学遂分崩离析。要之，陈氏意在评鹭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

鲁迅曾言所谓“大时代”，“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

^① 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4页。

2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

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①。若依此标准，那煌煌五千年中国史，唯有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堪入围其中。然清末民初之际，既有西力东侵，又有西学东渐，中西碰撞不已，亦融汇不休。如此时代语境之下，国人深感外患似亟于内忧，内忧又似重于外患，传统似敌不过西学，西学又不全适于华夏。于是内外逼仄挤迫之结果，便是历代循环的王朝模式宣告失效，销声匿迹，自西徂东的共和样板异军突起，取而代之。从此，帝国朝廷淡出，民族国家登场。短短七十余载，中国即完成翻天覆地之巨变，难怪连学问渊雅会通的陈寅恪也颇有“洋”兴叹之感，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②。可见，与之前三时代相较，清末民初确迥然不同。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他们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也只是外在状态，是通过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这一事实来实现的……他们身上携带着以前的成分，这就是区别”^③。简言之，这种不同代的并存姑且可称之为“同时异代”。而此现象，恰是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风貌之绝佳摹写。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一则题为《新陈代谢》的社论，借助通俗歌谣的形式，来描述民国肇造后的美好愿景：

① 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5页。

③ Bloch, Ernst: *Heritage of Our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97.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然像在中国传统“家底”异常丰厚的国度，江山易手、人心递嬗岂真如快刀斩乱麻般干脆爽利、一蹴可几？几乎同时，前清官僚于式枚（一说是王闿运）便私撰一联，俨然与主流话语立异：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①。

显然，虽同处一个线性时间点上，但就每个个体而言，其内心世界却活在不同朝代之中。辛亥鼎革后，此种时空错位感尤为凸显。当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宣称“今后立国大计，即首在排去专制时代之种种恶习”，“人人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②；当宋教仁心绪激昂地认定政党政治之春天已来临，力主“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时，前清故旧却是另一番模样。有人满腹愤恨，怒斥革命党人“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

^① 陈瀚一：《新语林》。

^② 上海《民主报》，1913年1月12日。

4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一部): 局中人

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有人心存焦虑,深觉民国之混乱纷扰酷似纲常毁坏之五代,“今日西方如战国,中夏如五代,今方在朱梁时代”。故复辟帝制,回到同光中兴之时便成为这批遗民之心声,甚至郑孝胥还视“民国乃敌国也”。一边“民国肇建百废兴”,一边“鼎革之后万事空”,一边是“图南此日联镳返,逐北他时奏凯回”之高昂畅快,一边却是“碑碣犹题清处士,衣冠不改旧遗民”之固执落寞,求变化与处常守故,锐意进取与抱道自任,此等巨大反差恰说明烙有不同朝代痕迹的人群在同一时空中游走并存。

即使于政治理念上认同共和,也未必意味着一定于文化主张上趋新。此情形在清末民初亦是常态,可谓之“同域异调”。科举停废实属近代文化之大事件。自此,迫于生计之需,传统士人不得不与传统经典绝缘,逐渐向知识分子阶层过渡。进入民国,伴随新式大学林立、旧式书院凋零之潮流,四部之学已让位于七科之学,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新式学人崛起,成为莘莘学子之偶像。然仍有人眷恋旧学,孜孜以求。革命元勋章太炎晚年退居苏州,开设国学讲习会,其兼诗、书、画、学于一身,优游于文、史、哲、医众领域,孕育出一批国学素养深厚的章门弟子。唐文治弃政从教,出掌无锡国专,秉承“正人心,救民命”之宗旨,规定“躬行、孝悌、辨义”为修身要求,仍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内容,诸如王遽常、吴其昌、侯堃、唐兰、毕寿颐、蒋天枢、钱仲联等国学人才皆出自该校。面对国难,为维护传统文化之一线血脉,享“民国儒宗”之誉的马一浮,亲赴大渡河畔,青衣山下,创建复性书院,立“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之学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之三戒,凭道义感人,以六艺授徒,金景芳、吴林伯诸人脱颖而出,将国学之流芳古韵承继绵延。合而观之,大学处于主流,乃引介西方学术之重镇,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书院降至边缘,为赓续传统文化之阵地,雅韵犹存,弦歌不绝。大学教授与书院先生,其思想世界,并不处在一个时

代，二者泾渭分明，底色各异，不过其皆致力于文化建设，倒也互有补益，相映成趣。

内心世界前后相隔，政治理念判若霄壤，文化主张古今不同，故活在“同时”的“异代人”难免正面交锋，即使昔日同道，也只得分道扬镳，“同途异归”。之前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有“寸金铸出民权脑”、“海天龙战血玄黄”之气概的李叔同、苏曼殊二人，进入民国后备受世事纷扰之苦，遂告别革命同仁，皈依佛门，以求解脱。同为章门弟子，黄侃与钱玄同之抉择亦大相径庭。黄始终以汉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对于五四新文化甚为抵制，坚信“即今国学衰苓，奇说充塞于域内。窃谓吾侪之责，不徒抱残守缺，必须启路通津”。而钱玄同则抛却往日崇古情结，蜕变为新文化急先锋，呼吁“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可见黄、钱之学，一仍于乾嘉之际徘徊，一引领五四文化风向，已是道不相谋，渐行渐远。无独有偶，于清末立宪运动中并称“三杰”的张謇、汤寿潜与郑孝胥，在民初亦境遇各异。张顺应共和，任职于民国，汤则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终认同革命，出任浙江都督，而郑孝胥始终视民国为仇讎，并指责张、汤“不知廉耻为何物？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二者区别在于，张、汤希望通过参与革命活动，告别“过去”，以实际行动与成就来建构“现在”，从而再造个人存在之合法性；郑却执意于书写、称谓、历法等象征仪式，企图借此留住“过去”，经由“过去”所认可的政治价值以形塑“现在”，并为自己的处境寻求正当性理由。一方与时俱进，一方未步时趋，故“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渊”，化为彼此对立的“异代人”，实在所难免。

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开篇，有一段被后世奉为经典之语：

6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①

清末民初即是如此，有的人活在当下，认为时代美好；有的活在过去，喟叹时代丑恶。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一句，意指自己同宋玉虽身处异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落之境况相同。笔者于此妄改一字，以“萧条易代不同时”来形容清末民初大时代中貌合神离、同时异代之众生相，似颇恰当。

是为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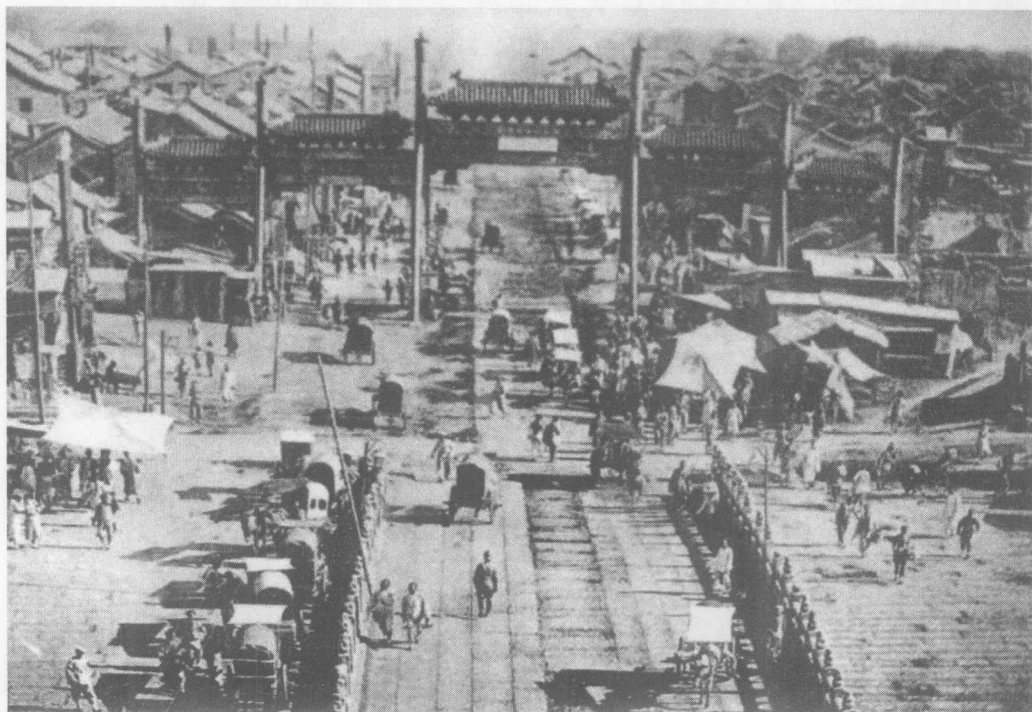
识于2013年清明雨后

西山斗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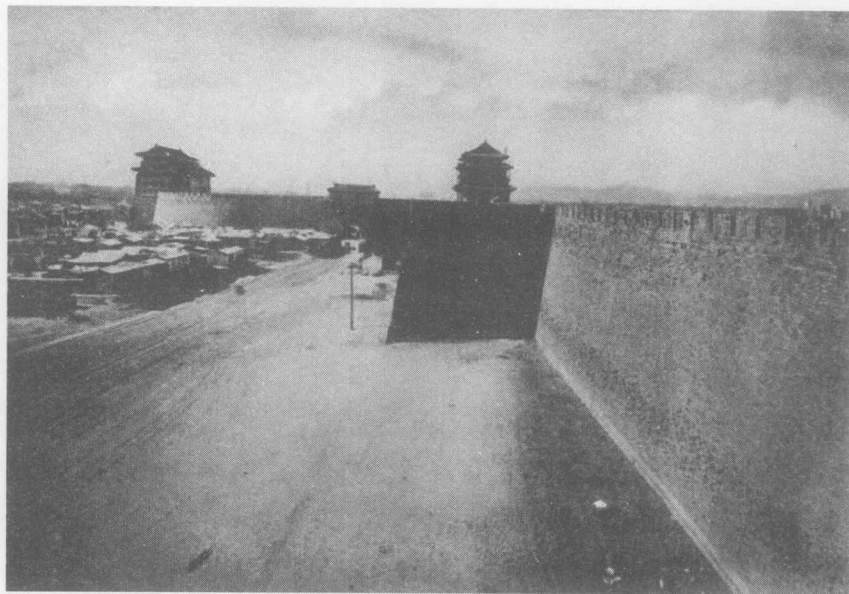
^① [英]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898年，北京崇文门城墙远眺。



1898年的前门大街牌楼。



1900年的北京宣武门。宣武门又称顺直门，指“武列宜扬”，宣武门外为菜市口刑场，囚车经常从此门出入，人称“死门”。



杂草丛生的紫禁城。

目 录

序 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马勇 / 1

自序 “萧条易代不同时”——清末民初众生相 / 1

守 局 / 1

荣禄：最后的满族大佬 / 2

载沣：哥非无能实无奈 / 15

善耆：王爷竟是改革控 / 30

铁良：木秀于林风必摧 / 40

鹿传霖：当贤臣遭遇黄昏 / 50

毁 局 / 64

载涛：让大清娱乐至死 / 65

那桐：庸臣焉知亡国痛 / 80

2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第一部): 局中人

荣庆: 末代文人终无用 / 93

徐世昌: 利国无能但利身 / 103

陈夔龙: 官运盈而国运尽 / 120

破 局 / 136

张继: 三将军变三大爷 / 137

柳亚子: “留当他年诗史看” / 150

李叔同与苏曼殊: 殊途同归入法门 / 171

出 局 / 182

胡思敬: 孤亭兀坐一轩眉 / 183

汤寿潜: 布衣都督乃过客 / 201

郑孝胥: 多情总被无情恼 / 212

林纾: 一个非典型遗民 / 223

殒 局 / 234

端方: 上台虽壮终必悲 / 235

黄远庸: 那些挥不去的痛 / 248

邵飘萍: 人生如断梗飘萍 / 263

格 局 / 281

“山雨欲来风满楼”——重温“同文馆之争” / 282